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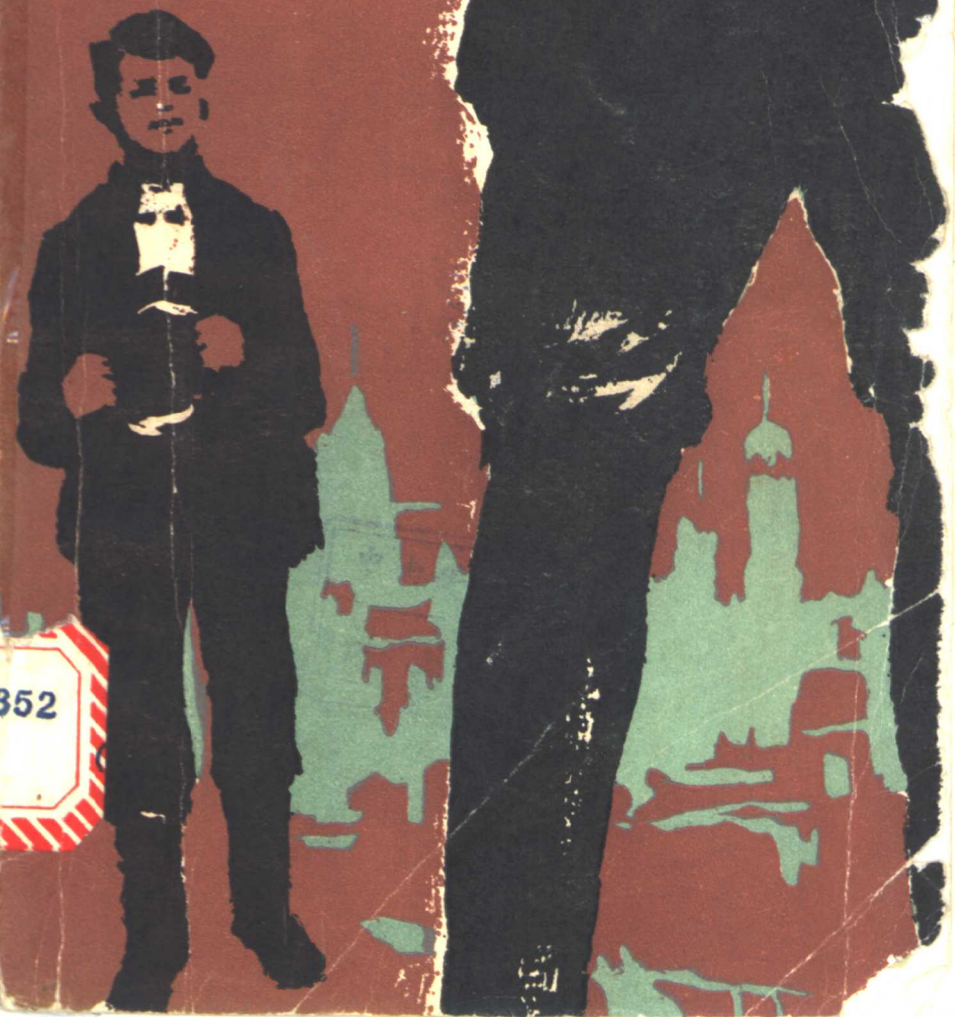
654905

生死逃难记

【法】约瑟夫·卓福 著

郑海鹰 译

林 桦 校



654905



0068968

生死逃难记

【法】约瑟夫·卓福著

郑海鹰 译

林 桦 校

中南矿冶学院



图书馆藏

生死逃难记

原名《一袋弹子》

Un sac de billes

〔法〕约瑟夫·卓福著

郑海鹰 译

林 桦 校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5印张 2插页 183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93-0104-9/I·4

10367·42

定价：1.50元

译者的话

这是一部真实的童年回忆录。作者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亲身经历的回忆，生动地再现了德国法西斯残酷迫害和屠杀犹太人这一历史的一个侧面。

十岁的约瑟夫，天真地从衣领上扯下写有“犹太人”的黄星，换来一袋弹子。纳粹分子的迫害迫使他与哥哥和家人离别，逃往南方自由区。他们靠机智勇敢以及好心人的帮助，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险关。然而，自由区里同样有追捕和迫害。他们在那里想方设法谋求生计，寻找失散的家庭。尤其是以惊人的胆量和镇静对付了敌人的严厉审讯，死里逃生。巴黎解放了，一家人又欢聚一堂，但父亲却被法西斯夺去了生命。

在千万个被追捕的犹太儿童中，小说中的两个小主人公是少有的幸存者。

作者1931年生于巴黎，他曾是理发师，在一次滑雪中受了伤。他是在住院期间写下这辛酸而又曲折的回忆的。1972年该书出版后即成为最畅销书之一，并被拍成电影，译成多种文字，作者也因此一举闻名，并继续写了多部青少年读物。

整个故事情节惊险曲折、跌宕起伏，文笔生动流畅。第一人称自述的手法贯穿始终，读来倍觉故事的真切。

第一章

弹子在我口袋深处的手指间滚来滚去。

这是我最喜欢的那颗弹子，我总是把它带在身边。有趣的是，这是所有的弹子中最丑的一个，它和我所欣赏的那些玛瑙或大个的渔沉子简直不能相比，这些玩意儿是摆在鲁本大叔在哈梅大街拐角处开的店铺的橱窗里的。

这颗弹子是泥土做的，表面的釉彩剥落成一块一块，显得粗糙不平，形成很多图案，就好象是教室里的地球仪缩影似的。

我很喜欢它，把整个“地球”放在口袋里挺好玩的，连高山大海统统都装在口袋里了。我是个巨人，所有的行星都装在我身上。

“咳，怎么搞的，拿定主意没有？”

我哥哥莫里斯在等我打弹子，他坐在肉店前面的人行道上。他的袜子总是穿得歪歪扭扭的，爸爸管他叫手风琴手。

他两腿之间堆着四个弹子，一个在上面，三个在下面呈三角形。

爱波斯坦大娘在门栏上看着我们，她是个身躯干瘪、脸皱得不能再皱的保加利亚老太太。奇怪的是，她还保留着被

大草原的风吹成紫铜色的脸庞。她坐在门内的一张草垫椅上。她是从巴尔干半岛上来的幸存者，巴黎的克里让固尔街上的灰黯的天空没有改变她的脸色。

她每天都呆在那儿，向那些往返于学校的孩子们微笑。

听说她逃亡时走遍了欧洲，躲过了沙皇对犹太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最后定居在巴黎第十八区这个角落。她在这里遇到了从东欧来的逃难者，有俄国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托洛茨基的同伙，还有知识分子和手艺人。她住在这里已有二十多年了，虽说上额和双颊的颜色没变，这些经历一定忘了不少。

她见我摇晃着身子就笑了起来，双手揉着穿破了的哗吱围裙，这围裙和我的衣服一样黑。那时候的小学生都穿着黑衣服，跟戴孝似的。这就是1941年的不祥之兆。

“咳，我的天，你怎么搞的？”

我当然会犹豫不决。莫里斯这家伙可真厉害，我打了七次，没一次打中。他在课间就赢了不少，加上现在赢的已有几口袋了，鼓鼓囊囊象气球似的，走起路来都感到吃力，满兜子尽是弹子。而我只剩下最后一张王牌——那颗最心爱的弹子了。

莫里斯嚷了起来：

“我可不愿意傻坐在地上等到明天……”

我开始打了。弹子在我手中哆嗦着，我睁大眼睛投了过去，又偏了。这下子全完了，没戏了，现在该回家了。

格登博格肉店的店面很奇特，它好象是浸在鱼缸里似的，玛卡德大街两侧的门面有些凹凸不平。

我把脸转向街的左边，因为莫里斯走在我右侧，这样他就看不见我在哭了。

“别哭了。”哥哥说。

“我没哭。”

“你一往街那边看，我就知道你在哭。”

我用罩衫袖子的翻里擦干了双颊，没有回答，并加快了脚步。我们要挨骂了，半个多小时之前我们就该回家了。

家到了，就在那儿——克里让固尔街上的理发店。店面用大大的、工工整整的字母写着“卓福理发店”，这些字母就象预科班的老师写的那样，粗中带细。

哥哥用肘碰一下我说：

“拿去，跟你闹着玩的。”

我望着他，接过他还给我的那颗弹子。毕竟是兄弟，哥哥刚从弟弟那里赢来最后一颗弹子就把它还给他了。

我取回这个小“地球”。明天到了操场上，我要用这狠狠地揍他的那些小弹子，赚回一大堆。别让他以为比我大两岁就可以对我发号施令。

不管怎么说，我都十岁了。

我还记得我们后来走进了理发店，各种味道扑面而来。

每个人童年时代可能都闻过特有的气味。我小时候就闻到各种香水味，从薰衣草香精到紫罗兰香精等一系列的香味。我经常见到搁板上摆着的香水瓶和没有气味的毛巾。剪刀的咔嚓声我也很熟悉。这就是我最早听到的音乐。

我们俩进到店时，里边挤得满满的，所有的靠背椅都坐满了。当我从迪瓦利埃面前走过时，他象往常一样拉了一

下我耳朵。我知道他这辈子是在我的理发店里度过的，他想必很喜欢装饰品和闲聊。这也情有可原：他上了年纪，孤伶伶地住在第四区的西马特路的一个三间套房里，这肯定不好受，怪不得爱到街上走走，在我们这些犹太人的家里度过整个下午。他总是坐在离前厅不远的那张椅子上。当所有的顾客都走后，他才起身坐在理发椅上说：

“只要刮一下胡子就行了。”

给他刮胡子的是爸爸。他能讲许多动人的故事，整条街的人都尊敬他，连火葬场的人也不例外。

我们做完了作业。那时我没有手表，但我猜时间误差总不会超过45秒。我总是预习新课，为了不让妈妈或哪个哥哥再把我们按在那儿学习，我们故意在房间里拖延一点时间，然后才溜了出去。

二哥阿尔贝正全神贯注地给一个大卷发的客人理美国式发型，可他还是转过身来说：

“这么快作业就做完了？”

爸爸也瞧着我们，但我们趁他在柜台找零钱的当儿溜到街上去了。

这正是美好时光。

1941年，克里让固尔门。

这是个使孩子们心驰神往的角落。如今的建筑学家们高谈阔论的“儿童设施”总使我感到不以为然。新楼群中间新空地上的沙坑、滑梯、跷跷板，一大堆的玩意儿，这些都是那些拥有无数张儿童心理学文凭的所谓专家为儿童们专门设计的。

可是这些设施却不吃香，不论是星期天还是其他日子，孩子们都玩腻了。

我不知道这些专家是否觉得有必要问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巴黎这个区的日子过得是那么快活：灰色的城市，店铺里的灯光，高高的屋顶，狭窄的天空，堆满垃圾箱的窄小的人行道，门铃，以及可以藏身的门厅，应有尽有。还有从门后忽然冒出来的门卫、马车、卖花姑娘，以及夏天的露天咖啡座。这一切构成一个一望无际的迷宫，交错纵横的大街小巷数也数不清……我们总能发现点什么。我还记得有次发现了一条河，它就在我们脚下延伸着，绕过一条很脏的街。当时我们真有探险家之感，很久以后我才得知这正是鲁尔克运河。晚上回家之前，我们还看着河上漂着许多脏东西，泛着粗柴油的彩色波纹从眼前流过。

“到那儿去怎么样？”

差不多总是莫里斯提出各种问题。

我正要回答，忽然两眼朝大街远远望去。我看见他们走来了，他们确实很显眼，是两个身穿黑制服，腰扎军皮带的大汉。他们脚蹬长统靴，恐怕得擦几天才这样耀眼。

哥哥转身低声对我说：

“是纳粹德国的党卫队队员。”

我们俩望着他们往前走，他们走得不快，步伐缓慢、僵硬，好象走在鼓号喧天的大广场上似的。

“你能肯定他们是来理发的吗？”

我并不认为两人当中哪个人的思路会比另一个来的快。我们紧贴着店门，如同两个连体双胞胎似的。两个德国人走

了进去，这时我们才放声笑起来。

我们俩的身子遮住了玻璃窗上贴的一张小纸条，它用黄底黑字写着：

犹太人商店

理发店从来没象今天这样紧张过，没有一个人敢吱声。那两个德国佬挺着死人般僵直的头，跷着二郎腿，在犹太人顾客中，等着把脖子伸给我的犹太人的爸爸或哥哥们。

我们两个犹太小孩在外面笑得直不起腰来。

第二章

大哥亨利掸净彼·科恩的脖子，客人离开座位，到柜台付款。莫里斯和我在后面看着事态的发展。

我心里真有点担忧：这恐怕有点太过份了。把两个放肆的家伙引到犹太人所在地的中心，胆子真够大的，也未免太大了。大哥转身向德国人说：

“先生，请。”

一个党卫队队员起身坐在理发椅上，把军帽放在膝盖上。他往镜里瞧瞧，好象他的脸是个与他毫不相干，甚至有点恶心似的东西。

“理得短一些，对吗？”

“对，头路请划直一点。”

我在记帐机后面惊呆得说不出话来：一个德国人会讲法语！而且比本区里的许多外国人带的口音还少。

我看着他，他挟着一个小巧发亮的左轮枪枪套，我还望见枪柄系着的链子轻轻地晃荡着，有点象我的那个玩具上的链子。过一会儿，他就会明白是在什么地方，是从哪儿出去的。他会大喊大叫，把我们全都杀尽，甚至连在楼上做饭的妈妈也不能幸免。她还不知道店里有两个纳粹分子哩。

迪瓦里埃躲在角落里看报纸，他身边是克里米厄，是个在保险公司工作的邻居，他带儿子每月来理一次平头。我认识小克里米厄，他和我在同一个小学念书，下课在一起玩。他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他个子矮小，可这时恨不得变得小而又小。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其他在场的人了。本来会认得他们的，可我忘记了，因为当时越来越害怕。

我只记得一件事：是二哥在给顾客已划过头路的头发上洒净发剂时先开了腔。

“战争可不是闹着玩的，嗯？”

德国佬惊动了一下，这恐怕是法国人第一次和他说话，并马上抓住了这个话题。

“嗯，不是闹着玩的……”

他们接着谈下去，其他人也插嘴了，气氛缓和起来，德国佬把话译给他的同伴听，这同伴听不懂法文，只是点点头，大哥只得设法让他别动。大哥，你可不能给这个高贵的日尔曼族老爷划道口子啊，局面已经够复杂了。

我看到爸爸在专心致志地理发，我吐吐舌头，过不了多久，屁股就要挨打了，可是还没打就已经生疼了。两个德国人还没出门，我恐怕就要骑在二哥阿尔贝的膝盖上，莫里斯骑在大哥亨利的膝盖上，直到他们俩手疼得顶不住为止。

“轮到您了，请。”

爸爸开始给第二个德国人理发。

我尽管害怕，还是笑了起来，这时萨米埃尔进来了。

他傍晚经常来，象老朋友似地简单问个好。他是个旧

货商，离我们家二百米远。他主要卖旧摆钟，但他的摊子里什么都有，莫里斯和我经常到那儿乱抄一通。

他乐呵呵地走进来。

“大家好。”

爸爸手里拿着理发巾，干净利落地把它抖开，然后围在德国人的脖子上。

萨米埃尔这时正巧看到了军服。他的眼珠一下子瞪圆了，比我的弹子还大三倍。

“哦，哦，哦……”他结巴起来。

“是呀，我们这儿来客人了。”二哥说。

萨米埃尔捋了一下小胡子，说道：

“没关系，等这儿的人少了我再来。”

“那行，问你夫人好。”

萨米埃尔还是一动不动地愣在那里，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陌生的客人。

“好的，好的。”

他嘀咕着，又傻呆了一阵子，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开了。

半分钟以后，从欧仁苏大街到圣奎路的尽头，从犹太人饭馆的深处到付现钞肉店的后间，谁都知道老卓福是个能招徕德国兵的理发师。

这真是天大的奇闻。

理发店里，闲聊在越来越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着，爸爸在添枝加叶。

德国佬在镜子里看见了我们俩探过来的头。

“那两个是您的小孩吗？”

爸爸笑了笑。

“是的，都是淘气鬼。”

德国佬点点头，显得很慈祥的样子。1941年的德国佬会同情犹太小男孩，真是可笑。

“哎，战争太可怕了，这都是犹太人造的孽。”他说道。

爸爸没停住手上的剪刀，现在他换上了推子。

“您是这么认为吗？”

德国佬毫不含糊地点点头，使人感到他的观点是不可动摇的。

“是的，我可以肯定。”

爸爸在他太阳穴上最后理了两下，然后象艺术家一样眯着一只眼睛一下。他抖一下手腕，拿掉理发巾，然后递上镜子。

德国佬满意地笑了笑。

“很好，谢谢您。”

他们走近柜台准备付钱。爸爸走到出纳台后面找零钱，我紧靠他对面，只见他昂着头，满面笑容。

两个德国兵戴上了军帽。

“您们满意吗？发理得好吗？”

“很好，好极了。”

“嘿嘿，”爸爸说，“在您们走之前，我要告诉你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犹太人。”

爸爸年轻时曾演过戏，晚上他给我们讲故事时，总是手舞足蹈的，就和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样。

此时，在柜台后面的爸爸卓福在观众面前的威武神色是任何其他演员也比不了的。

理发店里的时间顿时停止转动，克里米厄先站起来，他拉着已经站起来的儿子的手走了，其他人也跟出去。

迪瓦里埃一言不发，他放下报纸，收起烟斗。他儿子——弗朗索瓦·迪瓦里埃，也就是雅克·迪瓦里埃和诺爱米·玛什干夫妇的儿子，曾在圣·俄士达士教堂受过洗礼，是个天主教徒，他这时也站起来。我们也都站了起来。

德国人没有发火，他的两片嘴唇忽然变薄了：

“我刚才指的是有钱的犹太人。”

零钱在柜台的玻璃板上当啷一下，接着就是一阵大皮鞋的喀嚓声。

他们俩可能已经到了街的尽头，我们还是呆若木鸡地愣在那儿。有一阵子就象神话里讲的那样：一个狡猾的仙人把我们变成石像，怎么也不会复原了。

这惊心动魄的局面结束后，大家才慢慢坐了下来。我这才意识到已经免了一场挨打。

爸爸在接着干活之前，用手摸了摸莫里斯和我的头。我闭上双眼，免得让莫里斯说一天里见我哭过两次鼻子。

“你们别嚷了好不好？”

妈妈隔着墙板喊道。

妈妈每天晚上来瞧瞧我们的牙齿、耳朵和指甲。她拍拍我们的枕头，把床挡好，亲一下我们，然后离开房间。常常是房门还没关紧，我的枕头便飞过黑暗的房间，向莫里斯

砸去，他便跟车夫似地骂起来。

我们俩经常打架，尤其是晚上，还尽量闹得小声些哩。一般说来是我先动手。

我竖起耳朵听着，听到了床右边被子的窸窣声；莫里斯已离开床铺，我一听弹簧的嘎吱声就知道了。他此时正准备向我扑来，我绷紧二肱肌，又惊又喜，气喘嘘嘘，正准备投入一场激战……

灯亮了，莫里斯被照得眼花缭乱，赶紧跳回床去，我则极力装作入睡的样子。

爸爸进来了，再装模作样也没用了，他从不会被我们的诡计所迷惑。

“我接着把故事讲下去。”他宣布说。

这真是好极了，再过瘾不过了。

在我所有的童年回忆中，这是其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但后来我发现童年太短了。

有些晚上，爸爸进来坐在我或莫里斯的床铺上开始讲爷爷的故事。

孩子们总爱听故事，人们念给他们听，编造给他们听。可对我来说，这故事有所不同，它的主人公是爷爷。我在理发厅里可以看到他的镶在椭圆形镜框里的照片。他表情严肃，留着小胡子。天长日久，相片褪成粉红色，如同用过的新生婴儿的衣服。从他那剪裁得体的外衣中，可以隐约看出他一身健壮的肌肉，摄影师所要求的昂首挺胸的姿势使肌肉更加明显。他靠在椅子的靠背上，靠背单薄得可怜，好象在巨人的体重压力下随时都要塌了似的。

爸爸给我讲了许多故事，我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回忆，那就是一系列互有关联的冒险故事。它们就象舞台上某个背景前面的魔术套桌，这个背景或是雪白的沙漠，或是布满金色小钟的城市，市中心的街道高低不平。

我爷爷生了十二个儿子，他住在俄国比萨拉比亚加盟共和国的伊莉莎白格勒的敖德萨城南部的一个大村庄里。他既富裕，又慷慨，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

在沙皇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之前，他一直过得很幸福，并统管村里的整个部族。

这些故事伴随我度过童年。我仿佛看到，枪托往门上插去，窗户被砸得稀巴烂，农民们四处逃命，火焰掠过小木屋的横梁；我仿佛还看到，刀光闪闪，惊马嘶叫，马刺闪亮，我的祖先雅各布·卓福的高大形象猛然间从烟雾中腾空而起，直上云霄。

我爷爷可不是那种眼看着乡亲门被屠杀而无动于衷的人。

晚上，他脱下那件漂亮的有花枝图案的内衣，借着一盏灯光黯淡的灯笼的亮光，下到地窖里，穿上农民的长靴和外衣。他先往手心吐口唾液，再往墙上一擦，然后又抹在脸上，湿漉漉便是灰尘和烟垢。他就这样单枪匹马朝兵营区和士兵住的小屋出发了。他先在黑暗中窥视，当见到三四个士兵时，他不慌不忙，也不怒气冲冲，而是以一个正直人的纯洁的心灵，揪住那些当兵的脑袋往墙上撞去，狠狠地揍他们一顿。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口里哼着犹太人的小调。

后来，屠杀的规模越来越大，爷爷意识到他的惩罚性的